

乐黛云：在苦难面前不沉默、不沉浸

——2021年3月26日在“乐黛云先生《九十年沧桑：我的文学之路》新书发布会暨学术人生分享会”上的发言

陈越光

乐黛云老师九十年沧桑，人生即学术，学术即人生；人生成就学术，学术体现人生。她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拓荒者、奠基人，也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开创者。中国跨文化研究起步于比较文学，展开于文明对话和中国学研究，成形于跨文化学科教育，这一特色，就是基于开创者乐黛云老师的学术之路。由于她开创从比较文学到跨文化研究的学术贡献，2018年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首奖授予乐老师。

乐老师不仅是一位学者，她和汤一介先生一样，也是一位中国社会事业的推动者，80年代参与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，推动了80年代的文化热；90年代中，乐老师在中国文化书院创办了跨文化研究院，担任院长；1998年创办了中法合作的《跨文化对话》杂志，担任中方主编；2002年创办了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，担任主任；2016年创办了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，担任名誉院长；就在两个月前，乐老师还亲自出面支持建立青海丝路跨文化系列项目……。

然而，乐老师的学术成就和社会事业都只是她人生冰山的浮出水面部分，在《九十年沧桑》中我们看到了深沉水下的部分。《九十年沧桑》是一部学者个人史，一部当代知识分子史，也是一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史。我认为，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：真切的记忆，真挚的感情；最感动人的地方是：面对苦难，既不沉默，也不沉浸。在苦难面前不沉默，这是需要道德勇气的。很多人面对苦难曾经是沉默的，睁一眼闭一眼。我们今天也不敢说，我们能够始终对苦难不沉默。但当

苦难像苍天一样覆盖我们的时候，沉浸在苦难中，也没有出路，这需要用黑格尔的一句话“心怀日出，万物生辉”。乐老师在苦难面前不沉默，不沉浸，给了我们一种力量。我想，今天，我们如果有资格说，我们民族的感情和理性是成熟的，我们当代中国人是自信的，那么，我们一定也可以说，我们是敢于直面对手的，我们也是敢于直面人生的，而且首先我们是敢于直面历史的。我们面对历史，没有什么不得不忘却的，也没有什么必须要屏蔽的，这就是我们的自信。

读乐老师这本书，我在想：在她人生的大起大落中，什么是不变的？地点在变化：从贵州到了北京；从大学发配到农村到干校，后来“文革”到了牛棚；从国内到国外，又从国外到国内。身份更有变化：一个被文学启蒙的少女；一个被革命召唤的青年；一个年轻的党支部书记；一个中年的不认罪的右派分子，一个要陪斗的“牛鬼蛇神”；一个著名的学者，还原为一个共产党员。观念也有变化：乐老师早年是比较接受激进主义的，乐老师后来谈过，她越来越理解保守主义了，她自身也越来越宽容，身上有一种大地般的谦卑和亲切。当年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，大师大家群星灿烂，我们可以称为尊敬的先生、尊敬的老师比比皆是，但是如果要称为亲爱的老师，大概只有乐老师，永远是亲近的，亲爱的，甚至有时纵容我们忘乎所以。

面对这样一位亲爱的老师，但是当我读着这本书，我感觉不是面对一位老师，也不是在面对一个忘年的老友，而是在面对一段波澜汹涌的历史，这历史很冲击人。读着既有感慨也有难受，也有振奋。所以在她的这种种变迁中，我一直在想，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贯穿她的九十年呢？我看到了一条永恒的金线，这条线就是她自己觉得，她和祖国相连。青年时代被革命召唤，在内心深处是被痛苦的祖国所召唤；参加革命后对一些极左的做法不理解，那是她的人性祖国宽厚的胸怀相连；中年时蒙受冤屈，作为被“双开”的右派却不认罪，内心支撑的力量是什么？支撑的力量是她坚信“莫须有的罪名，不能把我从祖国的母体中剥离”。80年代在国外，犹豫要留下还是回去，最后觉得

生活和自由的写作在国外很好，但要从事学术事业，事业的展开必然和祖国的发展和人有极大的关系，所以还是要回国。这条永恒的金线在乐老师九十年沧桑中一以贯之。当然，今天我们讲祖国的话题很多，但是为什么乐老师的这种表述能感动人呢？能有共鸣呢？因为它不是说教，因为它不是从众，因为它不是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，因为它的源头是人性的善良和正直的一种关切。

在一次中国文化书院为乐老师祝寿时，她说她有三个幸运：首先是选择了文学，这是从小到老始终的热爱，一个人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是幸运的；其次是选择了北大，从事教育使她永远可以和年轻人在一起，也就永远和未来在一起，也是幸运的；第三是选择了老汤（汤一介先生）。乐老师是幸运的，我们也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有乐黛云老师，有汤一介老师，我们阅读他们的人生，在他们的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：有一种勇敢，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；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叫做看透生活，却依然热爱生活；有一种自由意志，叫做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这是我在他们的人生中读到的，今天，我也把这三句话献给乐老师。